第 42 卷第 1 期　　山东航空学院学报　　2025 年 2 月
Vol. 42, No. 1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Feb. , 2025

【教育部名栏 · 孙子研究】中国军事典籍外译研究专题

基于语料库的《孙子兵法》俄译本翻译风格比较研究

王莲涔，罗　天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目前，学界对《孙子兵法》在俄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缺乏应有的重视。为对《孙子兵法》不同时期俄语译本的风格进行对比研究，选取尼 · 约 · 康拉德和弗 · 维 · 马良文两个《孙子兵法》经典俄语译本，自建双语平行语料库，以分析类符/类符比、平均词长和句长作为参数，在词汇、句子和语篇三个层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康拉德译本倾向使用直译法，语言精练，句式表达较为复杂，翻译风格较为固化，注重译文与原文语言结构的一致性和准确性；马良文的翻译倾向于意译加直译，用词多样化，句子结构比较多变，翻译风格比较灵活，强调译文的可读性和接受性。两个译本在翻译风格上的差异与译者身份、目标读者、时代背景及翻译目的等因素密切有关。

关键词：《孙子兵法》；俄译；翻译风格；语料库；传播

中图分类号： E 892；H 15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86/j.issn.2097-4973.2025.01.002

《孙子兵法》是由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所著的中国军事典籍，也是世界三大最著名军事经典之一。它是传承和发展中国军事哲学思想的必读书目，也是中国军事思想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孙子兵法》走出国门一千多年，已被翻译成 50 多种语言，是被翻译语种最多、在国外传播最广的中国典籍之一。[1]

中国军事典籍虽然数量众多，但在西方的翻译和传播史较短，20 世纪初才有第一部英译本出现，甚至到 20 世纪末之前这种状况也并未改变太多，只有《孙子兵法》与《吴子兵法》等几部军事典籍有零星译本出现，整体少为西方译介和关注。这与中国其他学术流派典籍在西方汉学界广为流传、获得深入研究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出现这种情况有内外两个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中国古代的学术体系中，兵学较为边缘化，“兵学著作并未当成理论意识形态的著述来看待”，在诸子中无法占据一席之地，更多的是被视为“数术”、“方技”。相应的，西方汉学界对于军事典籍的翻译和研究也较边缘化。另一方面，以传教士汉学为起源的西方汉学，自创立后长期关注思想、人文类典籍翻译，较少关注军事典籍；待后期西方汉学中心转至美国后，出于现实利益需求，遂开始进行中国军事相关研究，但优先考虑现代战争，因此一开始集中于中国现当代军事的研究，较少关注古代兵学思想，到后期发现其不可分割的联系后又转而进行军事典籍的翻译和研究。[2]

收稿日期：2024-12-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孙子兵法》翻译、传播与全球经典化研究”（24FYYB01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时期中国翻译教育体系的建设与发展研究”（22AYY006）

第一作者简介：王莲涔（1973—　），女，黑龙江鸡西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典籍外译、语料库翻译学和俄罗斯汉学研究。
E-mail：liancen@swu.edu.cn

俄罗斯历来以军事强国著称，一直以来都对其他国家军事领域研究比较关注。中俄两国作为亚欧大陆的泱泱大国，来往频繁，交流密切，《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最高体现和兵学思想的集中表达，当然成为俄罗斯译介活动的对象。实际上，《孙子兵法》的俄译历史超过250年，比英语国家早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但译本传播影响远没有英译本那样广泛。

1772年，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成员列昂季耶夫（А. Л. Леонтьев，1716－1786）著《中国思想》一书中就收录《孙子兵法》缩减译本。该译本是从满语翻译成俄语，对《孙子兵法》的重要思想和经典语句进行了概括翻译，被认为是《孙子兵法》俄译的开山之作，首次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军事学说引进俄罗斯，揭开了俄罗斯译介和研究《孙子兵法》的序幕。

19世纪出版有《孙子兵法》的节译、改译和缩简译本，译者有俄近卫军司令部图书馆管理员格里鲍夫斯基（М. К. Грибовский）、俄罗斯科斯特罗马步兵团中校军官斯列兹涅夫斯基（Срезневский）、俄罗斯左近卫骑兵团参谋部军官瓦塔奇（Ватаци）、俄罗斯军总参谋部上校军官普佳塔（Д. В. Путята）以及汉学家王西里（В. П. Васильев）和格奥尔吉耶夫斯基（С. М. Георievский）。

1910年出版的翟林奈《孙子兵法》译本引起了苏联的重视，于1943年出版了以这个译本为蓝本的俄译本。该译本首次将《孙子兵法》进行全文翻译，开启了全译本的新阶段，是《孙子兵法》俄译史上的一大进步。

1950年出版了康拉德（Н. И. Конрад）的专著《孙子兵法——翻译与研究》。该书包括译者序、前言、译文、注解、孙子军事学说五个部分，内容丰富，语言精练，被公认为《孙子兵法》俄译的巅峰，在俄语世界影响深远。在其他俄语国家，如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学者都是以康拉德的译本为蓝本进行翻译和研究。这本专著的出版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它标志着《孙子兵法》的俄译不再依靠法语和英语译本，而是直接从汉语翻译成俄语。这本专著的出版将《孙子兵法》在俄语世界的译介活动推向了高潮，陆续出现了西多连科译本[3]、石耀华译文[4]、柯坚科译本[5]。进入21世纪，新增全译本21个。通过文献梳理，可以肯定地说：康拉德的俄译《孙子兵法——翻译与研究》使《孙子兵法》真正走进了俄语世界，并获得了高度认可。即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俄关系恶化期，也没影响俄罗斯学者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不仅有新的全译本，而且在很多著作中都有专章介绍《孙子兵法》，甚至出版了《孙子兵法》西夏译本及相关研究著作[6-8]。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俄罗斯对《孙子兵法》的关注与研究一直持续到现在。可以预见未来还会有相关研究。

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对《孙子兵法》英译研究历时较长，成果丰富，而对《孙子兵法》俄译研究却少得可怜。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孙子兵法》俄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笔者从语料库的角度考察20世纪和21世纪《孙子兵法》两个俄语全译本风格的异同，分析原因，希望为后续典籍俄文翻译与传播提供参考。

一、以语料库为基础的译者风格研究

俄罗斯著名学者维诺格拉多夫提出，研究一部作品首先要研究作品的语言系统，因为个人风格反映的不仅是作者构建文学作品的技法和原则，更是语言表达形式和内容的综合，具有独特性。[9]欧美学者将风格理解为“在特定语境下，特定人物出于特定目的而采用的语言使用方式，是个体或群体在一定情境中对语言的独特使用”。[10]

从翻译文体学角度看，译者风格就是翻译作品体现出来的体系化的语言使用特征。Hermans首次提出“译者的声音”的概念，将译者风格与翻译风格研究引入研究领域。他认为，译作是具有多重、分散、混杂和复调性质的双重文本，译者声音的痕迹在译作中随处可见。正是这些声音的痕迹构成了译者有别于他人的语言表达模式。译者是翻译的主体，常常在译作中融入自己的声音以弥合原作与目标语读者之间的隔阂，确保有效交流。[11]

Baker是将语料库引入翻译风格研究的先驱。Baker认为，基于语料库的译者风格研究可以从翻译语言特征分析和翻译策略与方法两方面入手，前者包括词语层面、句法层面、语义搭配

和篇章组织等层面，后者涉及不同译者在翻译具体词句、结构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与方法的比较。她根据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和叙事结构等参数分析了 Peter Bush 和 Peter Clark 的翻译风格。[12]

胡开宝提出译者风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译者风格是指译者在语言运用上的个人特点和非语言特点，包括翻译的选择、翻译策略的运用、序言和注释等。从狭义上讲，译者的风格是指译者的语言应用或语言表达偏好，或在译文中反复出现的语言表达。[13]

无论是译者风格还是译作风格研究都需要大量的语料作为支撑。语料库方法用于译者风格研究的最大优点在于采用容易量化的结构性参数，不存在个人偏见，能更为客观地揭示其他手段无法展现的语言特征，因此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本研究主要讨论狭义的译者风格，采用语料库的方法，统计译本的词汇和句法特征，揭示两个译本翻译风格的差异。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问题

本文主要研究问题有：两种译本的词汇、句法和话语层面的测量特征有什么不同？两种译本在翻译风格上的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二）语料选择

目前，《孙子兵法》俄语全译本有40余个[14]，根据其影响力，本研究选用了康拉德和马良文两个译本（以下简称康译和马译）。康译是《孙子兵法》第一个俄文全译本，在俄罗斯广为流传，被视为标准译本，是《孙子兵法》俄语翻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马译《中国军事战略》包括《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还包括《孙子兵法》各个时代的注释。马译既参考前人经验，又有自己独特见解，反映了21世纪俄罗斯研究《孙子兵法》的最新成果，在俄罗斯掀起了研读“中国军事”的热潮。

首先，笔者将语料电子化，剔除所有的副文本（包括译者注释），保留正文部分作为基本数据来源。其次，为了统计和研究译文的词汇密度和词性，笔者使用 TreeTagger 对两个译文进行词性赋码，使用 ICTCLAS 中文分词软件对原文进行分词和词性标注。然后，使用 Tmxmall 对原文和译文进行对齐，建立平行对比语料库。

（三）研究方法

在自建的语料库基础上，利用语料库检索软件 WordSmith 8.0 和 AntConc 3.3.2 分别从词汇（标准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平均词长）、句子层面（句子数量、平均句长）、语篇层面（衔接）对相关语言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并利用 SPSS20.0 对两个译本的数据进行统计检验，以确定两个译本的风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三、语料库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词汇层面

1.类符形符比 为了保证不同容量的语料库具有可比性，语言学家提出用标准化的形符类符比（Std. TTR）来衡量语料库的词汇变化，即对一定长度（通常为1000个字符）的文本分批进行形态特征比的平均，这样可以排除字符总数对结果的影响，使统计结果更加准确。

表1统计数据显示，两个译本的标准类符/形符比值均低于原文，主要是因为《孙子兵法》是用文言文书写的，语言更精炼。康译的标准类符/形符比低于马译，这表明马译的词汇多样性大于康译。卡方检验结果表明（$t=6.367$，$p=0.012<0.05$），两种译本之间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表1 康译和马译的类符/形符比统计对比

	原文	康译	马译
类符数	1020	2355	2708
形符数	5403	7966	8445
类符/形符比	18.99	29.56	32.07
Std. TTR	33.92	46.49	51.51
标准差	55.45	45.89	42.33

例1.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康译：Поэтому в ее основу кладут пять явлений. Поэтому войну взвешивают семью расчетами и таким путем определяют положение.

马译：Посему суди о военном искусстве исходя из пяти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определяй соотношение сил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расчетов, чтобы уяснить обстановку.

例 1 表明，康译中“故”被多次翻译为 поэтому，故词汇多样性偏低；而马译表达“故”的词汇丰富多样，有 посему суди о чем、вот почему、поэтому、итак、ибо、так、вот и、а 等。文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百姓”、“敌”、“胜”、“政”等词的翻译。

2.**词汇密度**　词汇密度是指特定文本中实词所占的比重，普遍采用的做法是“词汇密度＝实词数÷总词数×100％”。词汇密度说明的是文本信息量的大小和难易程度。文本的词汇密度越高，表明文本所承载的信息量越大，文本的阅读难度也越大。反之，一个文本的词汇密度越低，该文本所承载的信息量越少，文本的阅读难度也越低。

俄语的实词是指具有稳定词汇意义的词语，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数词和状态词。大部分状态词是由以－о结尾的短尾形容词和短尾被动形动词的中性形式转换而来，如 хорошо、сказано、решено，在形式上和副词类似，因此被统计在副词之内。

从表 2 可以看出，康译的词汇密度低于马译。这与上述类符形符的数据保持一致，即马氏译本承载了更多的信息。通过文本考察发现，马氏译本增加了更多的解释内容。统计结果显示，康译在翻译过程中使用了较多功能词，从而使语言更符合俄语读者习惯，降低阅读难度。SPSS 卡方检验结果表明两个译本在词汇密度方面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

表 2　康译和马译的词性及词汇密度统计对比

词类	康译	马译	词类	康译	马译
名词	2097	2388	数词	128	131
动词	1622	1688	实词数	4661	5344
形容词	434	721	总词数	7966	8445
副词	380	416	词汇密度/％	58.51	63.28

3.**平均词长**　一般文本的平均词长约为 4 个字母，小于 4 意味着文本相对容易使用，而远大于 4 意味着文本的词汇使用比较复杂。为了更好地比较两个译本的用词特点，笔者通过 WordSmith 8.0 统计了两个语料库中各个长度词的频次。然而，由于两个译本的总字数不同，每个长度的单词的频率就没有可比性。在本文中，为了更客观地比较各长度词在两个译本中的分布情况，笔者分别计算了各长度词在各自译本总词数中的百分比，并通过统计学上的卡方检验来验证词的使用差异。

表 3 统计数据显示，两译本中 5 个字母的单词所占比例最大，分别为 13.73％和 13.44％，而 1－8 个字母的单词之和超过 80％，这表明两个译本对一般读者而言阅读难度不是很大。由于大部分普通文本由 2－6 个字母的单词组成，笔者分别统计了 7 个字母的长单词的使用情况，通过卡方检验得到的卡方值为 27.25，表明在两个译本中长单词的使用存在显著差异，康译用长词的比例明显低于马译，对读者而言康译更通俗易懂。总体来看，康译平均词长为 5.3，标准差为 3.0；马译平均词长为 5.53，标准差为 3.06，说明两个译本整体用词难度相似，可读性难度差异不明显。从平均词长和长词使用情况看，康译的词汇阅读难度低于马译。这两个译本倾向于选择相对简单的词汇，译文通俗易懂，准确地表现了《孙子兵法》的简明语言，能够达成向俄语世界传播东方文化和精神的翻译目的。

表 3　康译和马译的平均词长统计对比

单词长度	康译		马译	
	词频	百分比/％	词频	百分比/％
1 个字母	804	10.09	808	9.57
2 个字母	842	10.57	786	9.31
3 个字母	922	11.57	971	11.49
4 个字母	827	10.38	744	8.81
5 个字母	1094	13.73	1135	13.44
6 个字母	977	12.26	1010	11.96
7 个字母	672	8.44	800	9.47
8 个字母	480	6.03	576	5.68
9 个字母	559	7.02	667	7.89
10 个字母	392	4.92	467	5.53
11 个字母	207	2.59	225	2.66
12 个及以上字母	205	2.57	256	3.03

（二）句法层面

就语料库的整体而言，句子长度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句子的复杂性。平均句长越短，句子越容易理解，反之亦然；句子长度的标准差反映了文本中句子长度围绕平均句长波动的程度；标准差越大，句子长度的变化越大。依据WordSmith软件，两个译本的句子信息统计结果见表4。

表4　康译和马译的平均句长统计对比

	原文	康译	马译
句子总数	396	458	567
平均句长	13.64	17.41	14.89
句长标准差	7.92	14.15	9.49

从表4可以看出，康译的平均句长为17.41，马译为14.89。这表明这两个译本都使用了中等长度的句子，对于读者而言阅读难度是可以接受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两个译本的平均句长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t=8.157$，$p<0.01$）。回归文本分析发现，两位译者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来处理长句。

例2.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

康译：Кто-еще до сражения-побеждает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м расчетом，у того шансов много；кто-еще до сражения-не побеждает расчетом，у того шансов мало .

马译：Тот，кто еще в своем родовом храме выстраивает победоносный план действий，расчеты делает тщательные. А тот，кто до войны не имеет хорошего плана действий，не делает тщательных расчетов .

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两个译本都很注重忠实地传达原文意思，康译在翻译过程中倾向采用和原文句式结构相似的俄语句式结构，而马译适当增加连接词，转换句式结构，拆分原句，从而造成了其译本句子数量的增多，使译文更符合俄语母语阅读者习惯。

（三）语篇层面

在话语中，衔接和连贯是研究中极为重要的部分。衔接指的是将句子连接成章的词汇或语法手段，而连贯性是话语的语义关联，是衔接的结果，是话语完整性的保证。在翻译过程中，如果适当加入衔接词，可以有效提高译文的连贯性，便于读者理解。[15]

汉语倾向于通过序列和隐含的语义联系来实现语义的一致性。《孙子兵法》原文是文学性文本，句法整齐，节奏感强，意义性强，隐藏着许多潜在的语义关系。相比之下，俄语是一种形态语言，句群之间的逻辑关系通常通过一定的衔接手段实现。因此，在《孙子兵法》的俄文翻译中，需要体现文本中隐含的语义关系，而连词是实现文本逻辑关系的重要手段。

俄语中连词数量非常丰富，分类和用法与汉语有很多差异。现代标准俄语语法中通常将连词划分为并列连接词和主从连接词。并列连接词按其所表示的意义关系可分为联合、选择、对比、递进、说明几类；主从连接词按其意义可分为时间、原因、条件、让步、目的、结果、比较和说明连词。本研究对两译本中出现的高频连词（取前10位）进行了梳理，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康译和马译的逻辑连词的统计对比

连接词	康译		马译	
	频次	百分比/%	频次	百分比/%
и	302	3.79	276	0.32
если	157	1.97	141	0.17
когда	122	1.53	57	0.67
что	80	1.00	100	0.12
поэтому	79	0.99	58	0.68
а	45	0.56	80	0.94
как	33	0.41	24	0.28
но	23	0.29	25	0.29
чтобы	21	0.26	30	0.35
总计	862	10.8	791	3.83

从表5中可看出，两个译本在连词的使用上表现出一定的共性和差异。共性表现在康译和马译都能运用各种连词将原文隐含的逻辑关系显现出来，使用频率前10的连词是相同的。差异表现在康译的翻译显化程度更高，这表明康译更多地使用复句，与上述康译平均句长的统计数据相吻合，这表明译者选择了一致的翻译策略。

（四）原因分析

通过对康译和马译的数据统计分析，可以发现两个译文存在如下差异：康译以文言文为蓝本的译文以归化为主，注重译文与原文语言结构的

一致性和准确性，译者多采用意译策略，语言精练，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风格。马译使用意译加直译，用词更为丰富多样，句式表达更多样，注重译文的可接受性。风格差异的背后必然存在多种原因，下文从译者身份、目标读者、时代背景、翻译目的等方面进行分析。

尼古拉·约瑟夫维奇·康拉德（Николай Иосифович Конрод）（1891－1970）兼具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双重身份。他是苏联时期和当代俄罗斯五位汉学院士之一。他不是以军事理论家的身份，而是以东方学研究者的身份，从文化和哲学的角度和深度来研究和解释《孙子兵法》。值得注意的是，康拉德对军事文献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并在研究中自由使用军事术语，用军人可以理解的语言解释孙子的思想。此外，康拉德还强调了《孙子兵法》中蕴涵着许多一般规则总是很容易从战争领域转移到政治和外交领域。而且《孙子兵法》一书对于理解远东国家（中国、朝鲜、日本等）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行动都具有重要意义 。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在研究中他既不站在欧洲中心论的立场上，也不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也不站在近代流行的中国中心论立场上，他研究孙子论著的基础可以称为军事哲学分析。[8]康拉德院士将语言、哲学和历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是苏联日本学的奠基人，也是首个关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俄罗斯汉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是俄罗斯古代中国军事思想研究的奠基人。

俄罗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关注是在美国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明显深化之后，当时美国在越南战争失败后强调通过非军事手段实现政治目标。康拉德似乎是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候——20世纪40年代末，即在战胜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胜利的喜悦中——转向这一主题的。康拉德认为在胜利之后出版《孙子兵法——翻译与研究》一书有现实意义和实际必要性。他指出，在中国传统中，对待胜利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如果付出的代价过高，胜利就一文不值。战争是通过杀人来实现目标，君子对它应淡然处之，战胜了亦非可以值得骄傲的事情，要用丧葬的礼仪来对待它（《道德经》第31章）。屡战屡胜的人最终也会失败，因为胜利的代价非常昂贵。康拉德特别关注《胜败论》和《利害论》。他认为这些研究在当时最有现实意义，并仿效中国古代作家的做法，告诫读者不要沉醉于胜利，因为胜利者会变得狂妄自大，引起其他国家的嫉妒，并使战败者渴求复仇。康拉德以东方学者的身份对待自己的作品，他表示并不想“创作一部狭隘的汉学专业性质的作品”，因为它首先针对的是军事专家、军事理论思想史家。康拉德本人指出，如果他的作品能引起专业军事研究人员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兴趣，如果他们能从中找到有用的东西，他认为自己完成了任务。此外，关于纯军事方面的问题，他指出《孙子兵法》一书是儒家文化国家军事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并提请读者和专家注意这一事实。也正是这一事实促使他对这一典籍进行研究。他本人是这样看待语言学家的任务的：“真正的语言学家不能只做语言学家。他必须通过语言看到思维、思想……看到人民的创造才能。”[16]

弗拉基米尔·维亚切斯拉沃维奇·马良文（Владимир Вячеславич Малявин）1950年出生于莫斯科，是著名汉学家、哲学家、翻译家，是中华文化在俄传播的先锋。除了汉语，他还精通英语、法语、日语和德语，其深厚的历史学和语言背景使他能批评和吸收各家研究成果，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他在描述翻译经历时说：“（我）想超越文本本身的语义，深入理解文本所产生的体验。许多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受到篇幅的限制，特别用心在遣词造句上，会考虑是用这个汉字代替别的汉字，句子的位置也是深思熟虑等等。因此，我想深入到中文文本的意义深处。”[17]

康拉德和马良文都是著名汉学家，他们对原文的理解都非常准确，都能够较准确传递原文的内涵意义，他们的译文在俄罗斯都被广泛接受。康拉德作为汉学院士，具有高度责任感，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让俄罗斯的军事家了解古代中国的军事理论，吸收它的精华和智慧，以期指导和改善当时的国家军事战略和对待胜利的态度。马良文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康拉德不同，21世纪中俄友好交往，更多的俄罗斯普通民众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他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传播中国文化，满足广大俄罗斯民众了解古老中国的兴趣和愿望，促进中俄文化交流。因此，马良文更注重读

者的接受性，语言丰富灵活，并不局限单一策略。他通过简洁凝练的句式、丰富多样的用词表达，来传递《孙子兵法》所蕴含的哲学内涵。康拉德和马良文译文实际上起到了“东学西渐”的效果。

四、结语

本文通过语料库方法，结合统计学软件，从词汇、句子和语篇三个层面对《孙子兵法》康拉德和马良文译本的风格特征进行了量化分析，并从宏观文化语境的角度探讨了风格差异的成因。70年前，康拉德率先认识到《孙子兵法》的军事应用价值，并对其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解读，为《孙子兵法》在俄语世界的接受和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也为后世学者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马良文则从哲学视角出发，重新诠释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他认为，《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军事经典，更是一个完整而成熟的世界观，其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精神完善经验和古老的生活方式。

翻译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之一，不仅是语言转换的过程，更是文化对接与融合的桥梁。本文对《孙子兵法》俄译本的风格比较研究，不仅揭示了两位译者在翻译策略和文化传递上的差异，也为提高中国典籍译本在海外的接受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翻译选择及其背后的文化逻辑，从而为中国典籍的对外传播提供更为精准的策略支持。

此外，本研究还为推动中国典籍俄译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研究可以结合更多译本，从跨学科的角度探讨翻译中的文化适应性问题，同时关注读者接受度的动态变化。通过不断优化翻译策略，我们可以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促进中外文化的双向交流与互鉴。

参考文献：

[1]苏桂亮.《孙子兵法》域外传播研究：以书籍流通为中心[J].滨州学院学报，2017(1)：11-22.

[2]王琰.西方学界的中国军事典籍英译：回顾与展望[J].外语研究，2022(4)：83-90.

[3]Сидоренко. Е. И. Сунь：цзы Трактат о военном искусстве[М]. Москва：Военное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Союза ССР，1955.

[4]吴九龙.孙子校释[M].北京：军事出版社，1990.

[5]SAWYER R. D. У-цзин. Семь военных канонов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М]. КотенкоР В. пер.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группа《Евразия》. 1998.

[6]Кепинг. К. Б. Тангутский перевод китай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трактата Сунь-цзы[М]. Ленинград：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1967.

[7]Кепинг. К. Б. Перевод на тангутский язык китай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трактата Сунь-цзы[J]. Ольдрогге Ю А. Страны и народы востока，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1971(11)：43-48.

[8]Кепинг. К. Б. Текстологическое и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перевода китай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трактата（Сунь-цзы）с комментариями трёх авторов[М]. Ленинград：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ениА. А. Жданова，1969.

[9]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О язык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М]. М：Москва. 1959.

[10]LEECH. G. ，Short. ，M. Style in Fiction：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M]. London：Longman，1981.

[11]HERMANS，T. The translator’s voice in translated narrative[J]. Target，1996(1)：23-25.

[12]BAKER，M.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J]. Target，2000(2)：241-266.

[13]胡开宝.语料库翻译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

[14]郭佳贺.《孙子兵法》在俄语世界的译介：源流、嬗变与前瞻[J].滨州学院学报，2023(1)：47-69.

[15]蔡永贵，余星.基于语料库的《论语》两个英译本的翻译风格研究[J].外国语文，2018(5)：127-136.

[16]Конрад. Н. И. Сунь—цзы Трактат о военном искусстве：Перевод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М].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1950.

[17]Малявин. В. В. Китайская воен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M].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Астрель》，2002.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styles of Russian translations of *The Art of War* based on a corpus

WANG Liancen，LUO Tia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 Art of War* in Russian-speaking countries have been neglected in academic circles by far. In order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linguistic style of different Russian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The Art of War*，the author selected two classic Russian translation versions by Nikolai Iosifovich Konrad and Vladimir Vyacheslavovich Ma Liangwen，established a bilingual parallel corpus，used STTR，average word length and sentence length as parameters and analyzed the translation styles at the vocabulary，sentence and discourse levels.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Konrad's translation tended to use literal translation method，with refined language，more complex sentence expression and a more solid translation style，focusing on the consistency of linguistic structures with the original text and accuracy of the translation；Ma Liangwen's translation tended to use liberal translation and literal translation，with diverse wordings，more varied sentence structures and a more flexible translation style，emphasizing the readability and acceptability of the translatio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two translation styles may be related to such factors as the translators' identity，target readers，historical background，translation purposes，etc.

Keywords：*The Art of War*；Russian translation；translation style；corpus；dissemination

（责任编辑：许　金）

引用格式　王莲涔，罗天. 基于语料库的《孙子兵法》俄译本翻译风格比较研究[J]. 山东航空学院学报，2025，42(1)：12-19.
WANG L C，LUO T.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styles of Russian translations of *The Art of War* based on a corpus[J]. Journ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2025，42(1)：12-19.